

# 威爾斯《世界史綱》的寫作、譯介與中國史<sup>\*</sup>

黃相輔<sup>\*\*</sup>

## 摘 要

英國作家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是企圖宏偉的通俗世界史創作。威爾斯以簡明流暢的筆法,講述從生命起源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涵蓋生物與人類演化歷程的普世史。威爾斯並非專業史家,其突破傳統史學框架的作法,使本書在暢銷之餘受到不少批評,毀譽參半。《世界史綱》的風行並不限於歐美,書中對多元民族與文化的重視,以及對中國史的討論,自1920年成書以來立刻引起中國讀者關注。威爾斯對於中國史的描寫,除了來自當代西方漢學家累積的普通知識,也得益於與梁啟超、丁文江、傅斯年、陳源(西滢)等眾多中國知識分子的親身交流。尤其梁啟超對《世界史綱》的翻譯與校訂出力甚多。書中跨學科領域的宏觀敘事,以及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範疇的書寫,也對梁啟超試圖改造中國史學、將史學科學化的「新史學」志業,提供了刺激與示範。威爾斯以演化論為基礎而欲塑造人類共同歷史的嘗試,雖然獲得部分中國讀者的讚賞,卻也遭到雷海宗等人批評仍然未脫離「歐洲中心論」思維,以西方的歷史發展為基準去比較非西方文明。

**關鍵詞：**威爾斯、世界主義、普世史、梁啟超、新史學

---

<sup>\*</sup> 本文研究初期曾分別在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荷蘭烏特勒支 2019 年會與中研院近史所「西學與中國」研究群討論會報告,感謝席間眾多師友提問,特別是范發迪、雷祥麟二位教授的建言。寫作過程中承蒙王道還、李峙暉、徐兆安、柯遵科、黃聖修諸位先生對初稿的批評,王汎森院士、蔡登山先生協助釐清傅斯年與陳西滢的傳記資料,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20年9月1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9月27日。

<sup>\*\*</sup>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 一、引言

新文化運動期間發言捍衛科學價值的地質學者丁文江（1887-1936）在探礦時發生意外溢逝。傅斯年（1896-1950）在《獨立評論》撰文緬懷摯友，讚譽丁文江是「中國的赫胥黎」，指出丁「以進化論為思想之基礎而多面發展……弄出些個雜趣雜學雜見識，又很近於威爾士。他也能寫那一部偉大理想的通史，只是他不能寫小說罷了」。<sup>1</sup>《天演論》作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名氣不在話下；曾師事赫胥黎，後來以創作科幻小說聞名的英國作家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通稱 H. G. Wells, 1866-1946），<sup>2</sup>也是廣受新文化知識分子推崇的作者。這兩位英國人都受過科學專業訓練，卻不限於專門撰述。傅斯年將留英取得理科學位的丁文江比擬為這兩人，顯露對其才學志趣的深刻瞭解。

傅斯年所謂「那一部偉大理想的通史」，是指威爾斯的《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威爾斯雖然以科幻作品奠定文壇地位，其實也是多產的社會評論家與科普作者。《世界史綱》是威爾斯跨足史學領域的代表作，試圖「以真實明晰之筆墨，在綿連一貫之記述中，敘述現今所知人類生活之全部故事」，<sup>3</sup>講述從地球初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的「歷史」。這部作品自 1919 年初版連載以來，宏觀的視野與新穎的通俗筆法造成各界轟動，屢次再版。《世界史綱》不僅在英語世界暢銷，也引起中國讀者關注。商務印書館於 1927 年發行中文版。傅斯年與丁文江在《世界史綱》的寫作與譯介過程中，分別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sup>1</sup> 傅斯年，〈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彩〉，收入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卷 5，頁 481-482。為徵引方便，以下省略著者及編者並簡稱為《全集》。

<sup>2</sup> 當代中文作者對其譯名紛雜不一，或譯韋爾斯、韋爾思、威爾士。

<sup>3</sup> 韋爾斯著，梁思成等譯，《世界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導言頁 1。以下簡稱為《史綱》，並省略著者與譯者。

《世界史綱》的創作極富企圖心。即便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這部作品仍是不落窠臼的奇書，不能以純粹的「世界史」視之。它開頭前 10 章從太陽系與地球講起，依序介紹岩石與地層紀錄、天擇與生物演化、爬蟲類與哺乳類的時代、人類的起源，乃至石器時代人類向世界各地的傳布。接著的古代史也別出心裁，先鋪陳人類不同種族的特徵，並闡述文明的曙光，即語言、文字、宗教與社會階級的形成。威爾斯跨出歷史敘述的傳統框架，統整自然科學及人類學知識來臨摹一幅全人類與生物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如果說這樣的開頭還不夠出奇，那結尾擘劃的未來就更大膽了：《世界史綱》尾聲提醒讀者戰爭之殘酷，甚至預警下一場大戰的來臨。威爾斯呼籲各國合作組成世界政府，促進全人類政治、文化上的統合，避免戰爭造成生靈塗炭。<sup>4</sup>全書多處宣傳作者的政治理想與社會改革主張。

《世界史綱》對不同民族與多元文化的重視，在當時充斥「歐洲中心論」的西方史學著作中誠屬異數。雖然其中大量內容仍不免以西歐或北美為主，威爾斯還是費盡心力介紹西方之外的世界。例如分別用整章的篇幅討論佛教的興起與傳播、穆罕默德與伊斯蘭教，以及成吉思汗和其後裔的諸帝國，<sup>5</sup>都是一般英語讀者視野外的題材。中國悠久的歷史與文化也沒被遺漏。威爾斯對中國的論述並非無中生有的想像，而是取材自與幾位中國知識分子的交流，包括因參加巴黎和會而訪歐的梁啟超（1873-1929）與丁文江一行，還有當時在英國留學的傅斯年與陳源（字通伯，筆名西滢，1896-1970）。其中，傅斯年與陳源的意見常見於原書正文或註釋，威爾斯甚至在原書序中點名二位致謝。<sup>6</sup>梁啟超則對《世界史綱》在中國的譯介著力甚深，不但「囑其公子思成君等譯成

<sup>4</sup> 見第 39 章第 14 節「下次戰爭之預言」與第 40 章「歷史之下一幕」；《史綱》，頁 1002-1023。

<sup>5</sup> 分別是第 25、31、33 章；《史綱》，頁 300-323、498-535、598-628。

<sup>6</sup>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1920), pp. vi-vii. 《世界史綱》原書版本眾多，為方便比較辨識，以下註釋將此版簡稱為 *OH 1920*。二人的英文名字在序中分別是 Mr. S. N. Fu（傅斯年）、Mr. L. Y. Chen（陳源）。另見《史綱》，導言頁 3。

中文」，並「親加案語」，欲「以之餉遺吾國學術界」。<sup>7</sup>商務印書館中文版保留梁啟超等人添加的譯註或案語，處處能見梁的影子。

從銷量與時人的證詞即可看出《世界史綱》的風行。原書初版在英國連載時，每期便銷出約 10 萬份；單行本於 1920 年 9 月發行，截至 1921 年底，在英國就銷售 15 萬冊，在美國更達 50 萬冊。<sup>8</sup>商務印書館中譯本問世四年之內，就發行到第四版。孔繁靄（1894-1959）在中譯本發行之初的書評，便指出「近年史學類著作銷行之多之速之遠，恐無出韋爾斯此書之右者」。<sup>9</sup>即便是曾撰文嚴厲批評《世界史綱》的雷海宗（1902-1962），也坦承其文發表兩年以來，「國人對於《世界史綱》的信仰似乎仍未減少，無論普通的讀者或中學大學的學生仍多以此書為有權威的世界史」，使他不得不重刊原評論，「盼望國人將來能少走不通的路」。<sup>10</sup>吳于廑（1913-1993）回憶最初接觸西方世界史是十幾歲時在江蘇寶應縣，「一個偏僻小邑裡見到的英國韋爾斯《世界史綱》的中譯本」。<sup>11</sup>由此可略窺《世界史綱》流通之廣，連蘇北的小縣城也能見到。

這樣一部在 1920-1930 年代獲得極大迴響的通俗世界史著作，現今華語世界的研究者卻極少關注。劉德美綜合分析威爾斯與《世界史綱》的論文是臺灣學界罕見的代表。<sup>12</sup>該文具體而微地爬梳威爾斯的生平背景、思想學問，以及《世界史綱》的毀譽，對研究者入門極富參考價值。中國大陸的相關論著稍多但也有限，且常以唯物史觀或階級鬥爭角度討論，批判威爾斯的世界史觀仍受歐洲中心論牽制，不乏對其書相當負面的評價。<sup>13</sup>朱慈恩的論文是新近論著中

<sup>7</sup> 王雲五，〈序〉，《史綱》，序頁 1。

<sup>8</sup> Michael Sherborne, *H. G. Wells: Another Kind of Life* (London: Peter Owen, 2010), p. 252.

<sup>9</sup> 孔繁靄，〈英國韋爾斯著《世界史綱》〉，《清華學報》，卷 4 期 2（1927 年 12 月），頁 1452。

<sup>10</sup> 雷海宗，〈書評：《世界史綱》〉，《史學》，期 1（1930 年 12 月），頁 246。

<sup>11</sup> 吳于廑，《吳于廑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25。吳原文未說明「偏僻小邑」為何，但在自傳中述及童年與少年時期在寶應縣城入學成長。

<sup>12</sup> 劉德美，〈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綱》——一部通俗的世界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8（1990 年 6 月），頁 513-528。

<sup>13</sup> 例如馬克堯，〈威爾斯《世界史綱》評介〉，《讀書》，1982 年第 12 期，頁 45-52；陳志強，〈雷海宗批評「歐洲中心論」——以〈評漢譯韋爾斯著《世界史綱》〉為例〉，《史學理論研究》，2012 年第 3 期，頁 128-132；吳延民，〈民國以來國內史學界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史學理論研究》，2015 年第 4 期，頁 116-126。

最可觀者，較持平地探討該書的優缺點，整理不少歷年來中國讀者的意見，可補劉德美前作限於年代缺乏材料之不足。<sup>14</sup>至於威爾斯在寫作時與中國人物往來的經過，也常隱而不彰。王汎森介紹傅斯年早年留英生活時，略微提到這段經歷。<sup>15</sup>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先生檔案》也收藏一本威爾斯親筆簽名的英文《世界史綱》。<sup>16</sup>除此之外，研究其餘人物的文獻鮮少提及此事，包括更受學界矚目的梁啟超亦不例外。<sup>17</sup>

本文爬梳《世界史綱》較少被注意到的中國因緣，即威爾斯在寫作期間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往來，以及《世界史綱》於 1920 年代在中國翻譯出版的過程。《世界史綱》內關於中國的篇幅不少，威爾斯也提出許多觀點，例如將漢唐之際與同時代的羅馬帝國相比，以及漢字筆畫繁複不利教育普及。威爾斯對中國的興趣與關照，除了其個人的思考，也源自他人的回饋。威爾斯不是專業歷史學者或漢學家。他綜合英語的普通二手材料，反映當代歐洲漢學或東方學研究累積的一般知識與普遍思索的問題。他又從與梁啟超、傅斯年等人的交流取材，採用其意見，因此《世界史綱》裡的中國，也相當程度反映自清末啟蒙至新文化運動期間，整個世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自身歷史與前途的省思。

---

<sup>14</sup> 朱慈恩，〈略論韋爾斯及其《世界史綱》在中國的影響〉，《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9 期 5 (2013 年 10 月)，頁 60-64。

<sup>15</sup>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 71。為徵引方便，以下簡稱《傅斯年》。

<sup>16</sup> 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頁 38。筆者感謝王汎森先生提供此訊息。

<sup>17</sup> 例如張朋園與丘為君的研究，雖論及梁的歐遊與返國後從事之文化事業，但幾乎未著墨威爾斯其人其書。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第 6 章，頁 135-159；丘為君，〈戰爭與啟蒙：「歐戰」對中國的啟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3 (2005 年 5 月)，頁 91-146。

## 二、尋找中國：《世界史綱》的寫作與出版

《世界史綱》是應運歐戰情勢而生的作品。作者鮮明的政治理想與對歷史教育的主觀看法，是撰述該書的強烈動機。因此在討論其中國因緣前，必須先說明《世界史綱》寫作的背景。<sup>18</sup>

威爾斯很早就有撰寫世界通史的想法，但開始認真構思動筆是在 1918 年下半年，當時歐戰已近尾聲。第一次世界大戰震撼並改變許多歐洲人，威爾斯也不例外。他自己對戰爭的破壞有幾分愧疚感：在大戰之初，他曾頻繁在報章撰文鼓吹參戰，聲稱這場對德戰爭是摧毀邪惡思想（普魯士軍國主義）的「理念之戰」，並發明那句流行的口號「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the War to End All Wars）。<sup>19</sup>然而隨著戰事持久和傷亡，威爾斯的態度也轉變。他仍認為有必要打這場仗，但戰後一定要重建國際秩序維持和平，方能不負慘痛代價，從傷害如此巨大的戰爭生出些善果。<sup>20</sup>在大戰後期，他積極宣傳建立「國際聯盟」的主張，也思考要撰寫一部富教育意義的世界通史。

歷史教育是嚴重的問題。威爾斯認為，歐洲各國學校裡的歷史課充斥國族主義教條，鼓吹本國的光榮與對他者的敵意，無疑是戰爭的催化劑。為挽救此弊，他認為應該有一套屏除狹隘國別偏見的歷史教材，述說人類「共通之知識」，才能塑造以全人類福祉為念的共同體的概念。正如《世界史綱》導言指出，「今日世界苟無公共之和平，即無和平可言；苟無全體之福利，即無福利可得」，除非具「公共之歷史觀念」，無從達成此和平大同理想。<sup>21</sup>另外，威爾斯也不滿學校歷史教育的零碎和僵化，淪為背誦君王譜系、朝代與戰爭等瑣

<sup>18</sup> 本文所述威爾斯事蹟取材自以下兩部傳記：David C. Smith, *H. G. Wells: Desperately Morta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ichael Sherborne, *H. G. Wells: Another Kind of Life*. 較簡略之威爾斯生平介紹，見劉德美，〈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綱》——一部通俗的世界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8，頁 514-517。

<sup>19</sup> David C. Smith, *H. G. Wells: Desperately Mortal*, pp. 219-221.

<sup>20</sup> Michael Sherborne, *H. G. Wells: Another Kind of Life*, p. 251.

<sup>21</sup> 《史綱》，導言頁 2。

事。歷史課之所以如此「無趣」，他認為根源在於教師將歷史視為「樣本」（sample）而不是「整體」（whole）。以生理學做比喻：假如學生學習人體生理，只專門討論肝臟，偶爾才稍微提及胃、橫膈膜或其他器官，那能學到任何「生理學」嗎？<sup>22</sup>威爾斯主張，歷史應該是「完整個體」；在討論細部之前，必需是「先以整體來講述的故事」。<sup>23</sup>

威爾斯於 1918 年 10 月開始全力投入《世界史綱》的寫作。他與妻子一起蒐集材料、閱讀，消化吸收知識，在歷史迷宮中摸索前進。對一位門外漢而言，他的寫作模式不能說不嚴謹：先以《大英百科全書》或《先烈之國》（*Martyrdom of Man*）等為導覽文獻，<sup>24</sup>再尋找專門書籍，並時時諮詢專家學者。每章初稿也交給幾位朋友試讀，反覆修改後再交由編輯校閱。<sup>25</sup>如此密集的寫作持續一整年，全稿終於在 1919 年 11 月完成。

《世界史綱》最初是以分期連載的形式付梓：總共有 24 期，從 1919 年 11 月 21 日起每隔兩週發行一期（附圖 1），至翌年 10 月 7 日連載完畢。這個連載初版包含多幅彩色插畫與上百張單色照片、地圖和圖表。連載即將完成前，又由另一家出版社於 1920 年 9 月發行「修訂版」（revised and corrected edition）單行本。為節約成本以降低售價，修訂版刪去了所有彩圖與照片，保留原來的地圖與圖表，並新增單色插畫。在接下來幾十年，威爾斯屢次修訂《世界史綱》，補充時事內容；甚至在他過世後，由別人接手增補二戰與戰後的發展，並根據最新的科學研究修訂前面關於史前時代的內容。<sup>26</sup>附表 1 列舉《世

---

<sup>22</sup> H. G. Wells, *History is One* (Boston: Reprinted by Ginn and Company from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19), pp. [1]-[3].

<sup>23</sup> H. G. Wells to E. D. Ross, 11 May 1919; David C. Smith,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H. G. Wells: Volume 3 1919-1934*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1998), Letter 1211, pp. 9-10.

<sup>24</sup> 《先烈之國》（1872）為英國作家里德（William Winwood Reade, 1838-1875）所撰的世俗西方文明全史，書中對基督教教條的批評曾引起軒然大波。威爾斯自稱受此書影響很深。

<sup>25</sup> Michael Sherborne, *H. G. Wells: Another Kind of Life*, p. 251.

<sup>26</sup> 關於《世界史綱》的出版與行銷，見 Matthew Skelton, "The Paratext of Everything: Constructing and Marketing H. G. Wells'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Book History*, vol. 4 (2001), pp. 237-275.

界史綱》的版本；由於不同地區、語言版本繁多，僅列出在英國出版的英文本及部分中譯本。

當威爾斯開始寫《世界史綱》時，他對中國的認識仍然相當模糊。他雖然肯定中國在其世界史拼圖中的地位，對如何下筆卻感到力不從心。他為此求助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首任校長羅斯（Edward Denison Ross, 1871-1940）。在 1919 年 5 月 11 日致羅斯的信中，威爾斯強調中亞與中國在其大綱裡的重要性，然而西方當代對此的歷史想像卻「一片空白」。他向羅斯抱怨，難以找到可靠的文獻來做宏觀的描述，也「找不到一本好的普通中國史書籍」，以至於他得「從《大英百科全書》裡零碎的片段來拼湊全貌」。<sup>27</sup>威爾斯希望向羅斯當面請益，甚至去他的課堂旁聽。

從《世界史綱》付梓後的內容來看，羅斯肯定給威爾斯不少關於參考文獻的建議。威爾斯徵引的著作，包括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中國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中國史》（*A History of China*），以及羅斯與史克萊恩（Francis Skrine, 1847-1933）合著《亞洲之心》（*The Heart of Asia*）等漢學或東方學作品。威爾斯特別重視宗教、科學等思想推動人類文明進展的影響力，因此對中國史的討論也大量徵引佛教與儒學研究的著作，例如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 1874-1938）《佛教中國》（*Buddhist China*）與翟里斯（Herbert Giles, 1845-1935）《儒學與其對手》（*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並參考英譯的《大唐西域記》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對玄奘的生平有特別詳細的描寫。儘管如此，威爾斯不滿市面上缺乏適合的普通書籍。他宣稱：「沒有真正好的、完整與通俗的，附地圖與插畫，描述早期及中古中國、蒙古（匈）與突厥民族的英語著作。」<sup>28</sup>

<sup>27</sup> H. G. Wells to E. D. Ross, 11 May 1919; David C. Smith,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H. G. Wells: Volume 3 1919-1934*, Letter 1211, pp. 9-10.

<sup>28</sup> *OH 1920*, p. 265, note 1.

除了從紙上尋找中國，威爾斯還與來自遙遠東方的客人面談。梁啓超帶領的考察團在倫敦停留之際拜訪威爾斯，並致贈小冊子《國際同盟與中國》。這篇文章原本是梁啓超發表在《國民公報》，論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等人提倡的國際聯盟及中國面對此倡議的態度。《世界史綱》引用梁在文中對春秋時代的描述。<sup>29</sup>梁啓超一行與威爾斯的會面，將在稍後詳述。

威爾斯在行文中常將中國與西方做比較。這種寫作技巧既是為了便於向英語讀者介紹較不熟悉的人事物，也顯示他將不同區域或文明的歷史編織進「整體」人類普世史的企圖。例如將秦始皇與亞歷山大大帝相比，稱「亞東之有始皇帝，猶之西方之有亞歷山大，均以統一世界為事」，只不過前者統治較久，確立了中國後世統一王朝的格局，而後者的帝國在其死後就迅速瓦解。<sup>30</sup>他形容玄奘的遊歷及好奇心「頗似希羅多德」，但沒有希羅多德的歷史觀念；墨子的兼愛思想則與耶穌之教誨極其相近。<sup>31</sup>上述文字皆可見威爾斯擅長運用類比手法。他也注重跨區域及文化的交流，留心描述中西交通史，例如在介紹唐太宗的盛世時，特別提到景教徒及阿拉伯人在中國的活動，<sup>32</sup>甚至還用一整節來鋪陳玄奘的印度之行。附表 2 整理出《世界史綱》裡有關中國的部分。

雖然威爾斯已盡量花篇幅介紹中國，但書成之後，不少中國讀者仍然不滿意中國史（或歐洲之外的其他文明的歷史）所佔的比重，並批評威爾斯的敘事仍不脫歐洲中心論的視角，以歐洲的成就做為衡量人類文化進步程度的普世標準。這類批評以雷海宗為代表。雷海宗受德國學者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影響，提倡「文化形態史觀」，認為人類史是由幾種獨立的文化區域各自發展演變，不同文化區域在歷史上少有往來與關連，故每個文明有其

<sup>29</sup> *OH 1920*, pp. 101-102; 梁啓超，〈國際同盟與中國〉，收入梁啓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中冊，頁 742-744。威爾斯徵引的是該文英譯的抽印本。

<sup>30</sup> *OH 1920*, p. 102; 《史綱》，頁 125。

<sup>31</sup> *OH 1920*, p. 316; 《史綱》，頁 438、493。

<sup>32</sup> *OH 1920*, p. 312; 《史綱》，頁 487。

獨特性和獨立的發展過程，彼此間無法比較優劣高下。從文化形態史觀看來，人類文明演變不是單一路徑的線性進化，也不存在整體的「世界史」。<sup>33</sup>雷海宗認為，人類歷史既不是一貫，也絕非一體；所謂世界通史，要不是自圓其說而不符事實的小說，就是由零碎而不連貫的民族專史所勉強湊成的組合。<sup>34</sup>因此他批評《世界史綱》「實在不是『史』，至少不是世界史」，最好也不過僅是「前有四不像之長序〔，〕中間被無關之事所參雜的一部西洋史」。他並舉證，《世界史綱》除去開頭講生命演化及結尾闡述威爾斯個人政治觀的章節，中間講人類歷史的 26 章，西洋人就佔了 16 章，約五分之三的篇幅；其餘 10 章的空間，威爾斯才「慷然慨然的讓亞述人、巴比倫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國人、猶太人、回人、蒙古人、日本人去擁擠擠的湊熱鬧」。<sup>35</sup>雷海宗的意見在當代中國讀者裡並不是孤例。其他批評者不見得是像雷海宗那樣秉持文化形態史觀或任何一套歷史哲學體系的史學專家，但也多認為《世界史綱》是透過歐洲人視角來看的、不完整的世界通史。陳源就曾在《現代評論》上感嘆：《世界史綱》實在只是歐美史大綱。<sup>36</sup>

### 三、傅斯年、陳源與《世界史綱》的修訂

1920 年正在倫敦留學的傅斯年及陳源，也是幫助威爾斯釐清中國史的功臣。剛從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畢業的傅斯年，是五四世代新舊矛盾的代表，既受中國古典教育薰陶，也是鼓吹新文化的刊物《新潮》的編輯及學生領袖。<sup>37</sup>傅斯年於 1920 年 1 月 2 日上船赴英，於同年 2 月末抵達倫敦。<sup>38</sup>他懷抱全面學

<sup>33</sup> 吳延民，〈民國以來國內史學界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史學理論研究》，2015 年第 4 期，頁 116-117；朱慈恩，〈略論韋爾斯及其《世界史綱》在中國的影響〉，《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9 期 5，頁 63。

<sup>34</sup> 雷海宗，〈書評：《世界史綱》〉，《史學》，期 1，頁 236-238。

<sup>35</sup> 雷海宗，〈書評：《世界史綱》〉，《史學》，期 1，頁 237。

<sup>36</sup> 西滢，〈閒話〉，《現代評論》，卷 3 期 77（1926 年 5 月 29 日），頁 9-11。

<sup>37</sup> 《傅斯年》，頁 33-41。

<sup>38</sup> 傅斯年，〈致胡適〉（1920 年 8 月 1 日），轉引自《全集》，卷 7，頁 11-14。

習西方學問的遠大志向出國：對標舉「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五四青年來說，能解決中國「根源問題」的西方學問，肯定是基礎科學。雖然傅斯年在赴英前對自然科學接觸不深，他在倫敦大學心理學系註冊，從頭學習實驗心理學、醫學與數學等科目。我們知道傅斯年後來在倫敦沒有取得學位，於 1923 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人文學科，並涉獵物理、統計等課程，甚至旁聽過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講述相對論的討論課。他也是在柏林期間認真轉向歷史語言學的研究。<sup>39</sup>王汎森指出，當時在歐洲的中國學生普遍忽視西方學問中的分科問題，喜好學習「能夠給多種社會現象以科學解釋」的學科。<sup>40</sup>傅斯年廣泛的興趣與涉獵，是五四世代新知識分子嘗試以科學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縮影。

陳源不像傅斯年那樣直接涉入五四運動，但也是思想與文筆西化的青年。陳源出國的時間更早，1912 年即赴英，先後就讀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當傅斯年於 1920 年初抵倫敦時，陳源已經在英國居留逾七年。相較於傅斯年，陳源的傳記資料與後世研究較稀少；他最著名的事蹟，恐怕是返國後主筆《現代評論》雜誌時，與魯迅（1881-1936）因各種意見不合引發的筆戰。或許是由於在英久居的薰陶，陳源的文筆感染了英式諷刺尖銳機智的風格。傅斯年曾評論：「通伯與兩個周實有共同處。蓋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輕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sup>41</sup>傅斯年也讚賞陳源主編《現代評論》的成績，尤其是「閒話」專欄文章，「真聰明伶俐，自成一種品質、格調，不勝佩服」。<sup>42</sup>其他時人也給陳源的文采好評，例如梁實秋（1903-1987）將其散文與胡適（1891-1962）、魯迅、周作人（1885-1967）相提並論，稱讚其文字「晶瑩剔透，清可鑒底」，筆下「如行雲流水，有意態從容的趣味」。<sup>43</sup>

<sup>39</sup> 傅斯年在倫敦與柏林的留學生活，見《傅斯年》，頁 68-81。

<sup>40</sup> 《傅斯年》，頁 73。

<sup>41</sup> 傅斯年，〈致羅家倫〉（日期不詳），轉引自《全集》，卷 7，頁 31。

<sup>42</sup> 傅斯年，〈致胡適〉（1926 年 8 月 17、18 日），轉引自《全集》，卷 7，頁 41。

<sup>43</sup> 梁實秋，〈梁序〉，收入陳西滢著，《西滢閒話》（臺北：文星書店，1964），序頁 1。

目前缺乏威爾斯在寫作《世界史綱》時與傅斯年、陳源來往的文獻紀錄。據王汎森表示，傅斯年在英國的物品很少保留下來；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要考查其在英國的留學生活細節非常困難。<sup>44</sup>更不用說較未受後世關注的陳源。只能從兩人後來的文章、書信以及《世界史綱》文本，來推敲他們與威爾斯來往的蛛絲馬跡。所幸《世界史綱》多次修訂再版，又有將專家學者不同的批評意見以註解方式處理的特色，因此藉由比較不同版本的《世界史綱》，能夠重建威爾斯寫作過程中，傅、陳二人參與的時序。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世界史綱》初版於 1919 年 11 月開始連載時，開頭的序及致謝詞未見傅斯年與陳源，且內文也只提到梁啟超。換句話說，傅、陳不太可能涉入威爾斯初稿的寫作，兩人參與的是後續的修訂。<sup>45</sup>其次，陳源與威爾斯取得聯繫的時間必定早於傅斯年。這可以從連載版第 31 章「亞洲七百年史」中的一個小註透露。威爾斯在此段宣稱，中國在魏晉南北朝與唐代雖然保持「和平的進步」，但在某些事物上「相當保守」，例如美麗精細卻繁複的漢字「毫無改變」。陳源則指正雖然漢字的印刷體沒有變化，但發展出供日常書寫及通信使用的「草書」（*cursive script*）。威爾斯將陳源的意見放入註解。<sup>46</sup>這部分連載大約在 1920 年 5 月 6 日刊出，此時內文完全不見傅斯年的蹤影。威爾斯後來參考傅斯年與荷蘭漢學家戴文達（Jan Duyvendak, 1889-1954）的批評與建議，在修訂版大幅改寫此部分，並在註解中感謝二人。<sup>47</sup>原本的段落連同陳源意見的小註，就在修訂版中被刪除了。由此可見，傅斯年與威爾斯聯繫的時間應是在 1920 年 5 月與 9 月之間；而陳源在 1920 年 5 月前就與威爾斯有所來往。

傅斯年和陳源最初如何接觸《世界史綱》？現有資料難以考證。傅斯年抵達倫敦時，正值《世界史綱》初版連載期間。連載出版商投注大量資源行銷，

<sup>44</sup> 《傅斯年》，頁 71-72，註 18。

<sup>45</sup> 這也能從傅斯年抵英的時間看出：《世界史綱》初版開始連載時，傅斯年還沒啟程出國。

<sup>46</sup>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London: George Newnes, 1919-1920), p. 397, note 1. 以下將此連載版簡稱為 *OH 1919*。「亞洲七百年史」在商務印書館中譯本是第 30 章。

<sup>47</sup> *OH 1920*, p. 310, note 2.

在各大報紙上刊登廣告，加上威爾斯的名聲，促成連載前半每期超過十萬本的銷售盛況。<sup>48</sup>筆者以為，初履異國而仍感覺新鮮的傅斯年，應該能注意到這現象，也可能是陳源向傅引介《世界史綱》甚至威爾斯本人。雖然傅斯年赴英時志在學習心理學，但他對以種族為中心來分析歷史及地理上「民族變態」的方法，原本即很有興趣。<sup>49</sup>《世界史綱》以多元種族與文明演進角度切入的宏觀敘事，不難吸引他的目光。

傅斯年與陳源分別對《世界史綱》提出不少意見，幫助威爾斯修訂。傅斯年最主要的貢獻是在「亞洲七百年史」一章對中國中古史的敘述。前面提到，這部分原本非常簡略，經由傅斯年與戴文達分別提出建議，威爾斯才大幅改寫，內容豐富不少。威爾斯在修訂版中，將羅馬帝國的衰亡與同時期的中國漢末至唐初這段歷史相比，認為此時的中國「實有根本上之破壞與改造流行其間」，和歐洲的經歷相似。威爾斯引用傅斯年的見解，觀點上深受後者影響：

傅君以北魏擬之於歐洲之查理曼帝國。蓋北朝蠻族之中國化，亦猶查理曼大帝以蠻族而受羅馬化也。因北朝之蠻族與中國北部之民族混合，而隋代出焉。隋更征服南朝而統一中國。……中國之文藝復興始於隋而盛於唐，據傅君言此中有一真正之新生氣焉。<sup>50</sup>

傅斯年並進一步闡述，認為唐代文明特異的新精神，是由於中國固有之文藝、經學，加上印度傳來之佛教，以及「北方強健之風」，這「四大原素」混合而「新中國以出」。因此傅斯年認為從北朝以迄隋唐，「誠一澈底變化之時代也」。<sup>51</sup>

<sup>48</sup> Matthew Skelton, "The Paratext of Everything: Constructing and Marketing H. G. Wells'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Book History*, vol. 4, pp. 246-247, Table 1.

<sup>49</sup> 傅斯年在北大讀書時發表過〈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即倡議「宜據中國種族之變遷升降為分期之標準」。另外，他也提過選擇赴英留學的理由即是距歐陸近，「多些見到民族變態的機會」。見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1918）、〈留英紀行〉（1920），轉引自《全集》，卷1，頁33、400。另參見《傅斯年》，頁422-429。

<sup>50</sup> *OH 1920*, p. 311; 《史綱》，頁485-486。

<sup>51</sup> *OH 1920*, pp. 311-312; 《史綱》，頁486。

據朱經農（1887-1951）表示，《世界史綱》把漢、唐間的變遷與東西羅馬帝國分裂後的歷史相提並論的說法，頗引起美國學界注意與批評。<sup>52</sup>

陳源則反駁威爾斯對漢字與秦始皇的觀點。威爾斯在連載版中提到，漢字是特殊且複雜的文字系統，使用者需牢記眾多符號才能運用自如；他認為這是造成中國由少數「讀書人階級」統治，思想學問無法普及的原因。<sup>53</sup>修訂版中，威爾斯在註解補充陳源的看法：

吾友陳君以此言為不盡然。彼謂中國歷代皇帝每令人民習經書以阻其知識之發展。明代尤甚，當明太祖改革科舉時，曾謂「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妨礙中國知識之發展者，實四書五經云。<sup>54</sup>

可見陳源認為中國知識發展之落後，不能全歸咎漢字，而是統治者定儒家經典為一尊的僵化科舉體制。威爾斯又引用《大英百科全書》裡英國東方學者道格拉斯（Robert K. Douglas, 1838-1913）撰的「中國」條目，對秦始皇的描述較偏正面，將其形容為「治國亦不法古」的激進改革者，為了穩固統一、破除封建傳統及舊思想而焚毀典籍。陳源不同意此說法，認為始皇帝焚書動機出於愚民政策，目的是「對百姓的思想奴役」（intellectual slavery of the people）。<sup>55</sup>

威爾斯繼續在「亞洲七百年史」裡的「中國智慧之束縛」（Intellectual fetters of China）一節申論其對漢字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在近世以來發展遲滯並落後於歐洲的原因，正是文字。威爾斯指出，相較於歐洲拼音文字簡單易學，「中國人則須記憶一大群複雜之符號及成語」，因此雖然中國能識常用字者眾，能閱讀書報且具備常識的普通知識分子卻少，更遑論能理解高深文字的菁英，「中

<sup>52</sup> 朱經〔朱經農〕，〈《世界史大綱》（威爾斯著）〉，《新潮》，卷3號2（1922年3月），頁47。

<sup>53</sup> *OH 1919*, p. 132; 《史綱》，頁142。

<sup>54</sup> *OH 1920*, p. 111, note 1; 《史綱》，頁142。據《唐摭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實為唐太宗語，非明太祖。引文此處不知是陳源還是威爾斯轉述錯誤。見王定保著，陽羨生校點，《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06。

<sup>55</sup> *OH 1920*, p. 124, note 1. 這個註解在1923年後的版本被刪除了，因此商務印書館中譯本無此註，見《史綱》，頁159。朱經農也和陳源有同樣的意見，見朱經〔朱經農〕，〈《世界史大綱》（威爾斯著）〉，《新潮》，卷3號2，頁47。

國人達此程度所耗費之時間與精力實遠過歐人」。漢字難學的特性搭配科舉考試選才的制度，不適合富創造力者出頭：

中國之字體既如此奇特，從此種文字而出之教育制度，遂為屢代甄別學子之難關，頗宜於易受範鑄及學問淵博之心思而不適於流動富創造力之學士，故後一種人恆不能居權要而大展其勢力焉。<sup>56</sup>

威爾斯指出，近來中國已有人倡議簡化字體，甚至「採用字母制」，然而中國要邁向拼音文字之一大障礙，在於各地方言發音紛雜不一，因此「近時中國謀改造教育者之希望，即在乎應用拼音制書法於現行官話之可能」。他欣見這些改革文字的努力，「以新方法解放其心思上之束縛」。<sup>57</sup>

威爾斯對漢字的這番見解不是什麼原創想法。早在啓蒙時代，法國哲人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論及為何中國的科學進展相對其源遠流長的歷史顯得如此微薄，便將中國複雜的語言文字列為原因之一。<sup>58</sup>晚清在中國活動的基督教傳教士也不乏這種成見。例如美以美會傳教士蒲魯士（William N. Brewster, 1862-1916），於 1901 年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發表〈中國的智力束縛及其解救之道〉（“China’s Intellectual Thralldom and the Way of Escape”），主張拼音文字易於表意文字，所以用各地方言拼寫的教會羅馬字是傳教必需的工具。蒲魯士形容漢字是「束縛著中國智力的鎖鏈」，而保護中國文字的守舊思維如同世上其他「各種形式的奴役」，有朝一日可能被推翻。<sup>59</sup>以上修辭與《世界史綱》裡「中國智慧之

<sup>56</sup> 《史綱》，頁 491。

<sup>57</sup> 《史綱》，頁 491-492。

<sup>58</sup> 伏爾泰在 *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一書有相關論述，見 Voltaire, *An Essay on Universal History, the Manners, and Spirit of Nations*, trans. Nugent (London: J. Nourse, 1759), p. 20. 另見韓琦，〈關於 17、18 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科學落後原因的論述〉，《自然科學史研究》，卷 11 期 4（1992），頁 296；史景遷（Jonathan Spencer）著，林熙強譯，《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頁 180-182。

<sup>59</sup> William N. Brewster, “China’s Intellectual Thralldom and the Way of Escape: Part II. The Way of Escap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32:7 (July 1901), pp. 321-327. 引句出自 pp. 324-325: “Every form of slavery has been thus intrenched behind vested interests as vast and apparently as adamant as now protect Chinese hieroglyphics. Yet the world has seen the overthrow of one after another of these tyrants of humanity...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who can say that the chains

束縛」的標題可謂異曲同工。不僅西方傳教士，清末民初不少中國人投入切音字運動，思索漢字拼音改革，從最極端的廢除漢字到折衷的設計發音符號輔助漢字，各種方案無所不包。<sup>60</sup>在威爾斯撰寫《世界史綱》前，早已有廣泛的論述認定中國語言與文字是造成這古老文明發展停滯的阻礙。

傅斯年與陳源也參與了對話。「中國智慧之束縛」末尾有段極長的註解，收羅多位學者的回應，表示「有比文字還更深層的原因造成中國的停滯」。在 1920 年修訂版中，傅斯年與陳源的意見也被加入此註解中。傅、陳兩人皆強調中國式父權家庭體制（the institution of the patriarchal Chinese family clan）的不良影響，認為子女在獲得經濟自主前就被包辦婚姻，難以繼續深造或創業。陳源另外強調科舉考試「麻痺」中國士人心智，妨礙甚至拒絕任何創新思考。傅斯年則指出，可惜由於材料缺乏，《世界史綱》對先秦時期著墨極少，忽略了這段百家爭鳴、中國思想活力可比古希臘雅典盛況的時代。<sup>61</sup>

從傅斯年、陳源與威爾斯的對話來看，《世界史綱》也即時反映了中國新文化運動追求人格獨立的自由思潮。威爾斯十分留意五四後中國的變化，特別是在他所重視的教育與文字改革方面的進展。在《世界史綱》1920 年與 1923 年的修訂版中，威爾斯陸續更新中國文字改革的成果：

已成之拼音字母，已在普通學校中講授之，報紙及短篇文字亦有使用之者。至於斷喪青年創造力之嚴格科舉制度早已廢除。文言中之成句亦力求簡單。因此遂益容易而明白，字體雖尚仍其舊，而寫讀均易，較之古文已頗能適應近代之需求，為文字發表之利器矣。<sup>62</sup>

---

that bind intellect of China are eternal?” 另參見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8），頁 15-16。

<sup>60</sup> 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頁 32-65。

<sup>61</sup> *OH 1920*, pp. 315-316, note 1. 這個註解在 1925 年後的英文版被刪除，商務印書館中譯本也沒有收錄。

<sup>62</sup> 《史綱》，頁 492。引句中之底線為筆者添加。引句前半未加底線者，初見於 1920 年修訂版；引句加底線者，則為 1923 年版新添。見 *OH 1920*, p. 315;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1923, the definitive edition), p. 302.

此處的拼音字母，是指教育部於 1918 年 11 月公布的「注音字母」（後來改稱「注音符號」），用來輔助漢字識讀。後面所謂文言力求簡單，原文指的就是白話文運動。<sup>63</sup>《世界史綱》問世時，新文化運動鼓吹的語文改革也正如火如荼進行。教育部在 1920 年 1 月已訓令全國國民學校將初級小學國文改為語體文，規定宜先教授注音字母，正其發音。<sup>64</sup>《世界史綱》清楚捕捉到中國正在巨變的潮流。藉由和傅斯年、陳源的交流，威爾斯對中國現況的討論，也映射著五四青年知識分子觀照家國歷史與其前景的影子。

#### 四、梁啟超歐遊與威爾斯的交流

梁啟超自 1917 年底辭去內閣職務後，轉向文化與教育活動。在政壇失意的梁啟超，希望藉由文教事業「從思想界盡些微力」，力圖東山再起。歐戰於隔年漸露和平曙光，梁希望赴歐實地考察，獲取新的刺激。<sup>65</sup>北京政府同意資助梁啟超，以「歐洲考察團」的名義作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會外顧問。考察團自 1918 年底從上海出發，在歐洲停留近一年，於 1920 年 3 月返國。團員包括丁文江及張君勱（1887-1969）等多位不同領域的專家，擔任梁的智囊。

這次考察對梁啟超等人在 1920 年代的文化事業影響相當深遠。梁啟超早已仰慕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與德國哲學家倭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人生哲學，此行得以親自請益，張君勱還滯留德國向倭鏗學習。<sup>66</sup>另外鑑於俄國革命，梁一行也特別留意調查社會主義在歐

---

<sup>63</sup> 原文：“There has also been a considerable simplific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introducing spoken idioms into written Chinese. This makes for ease and lucidity; even in the old characters such Chinese is more easily read and written, and it is far better adapted than classical Chinese to the needs of modern literary expression.” 見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the definitive edition, p. 302.

<sup>64</sup> 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頁 72。

<sup>65</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135-136；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梁啟超諸人的文化努力與五四思想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5（2019 年 9 月），頁 55-58。

<sup>66</sup> 梁啟超諸人對柏格森、倭鏗哲學的推崇與譯介，見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啓蒙》（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特別是第 1、2 章。另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163-165，註 5。

洲的潮流。梁啓超返國後組織「共學社」，加上先前成立的「尚志學會」，這些與梁關係密切的團體大量編譯新書，不少題材便是柏格森、倭鏗的哲學或社會主義的相關研究。梁啓超還發起「講學社」，邀請西方學者訪問中國，也是在旅歐時萌生的想法。而他記錄旅途中所見所聞的《歐遊心影錄》，反省戰爭對歐洲社會與物質文化的破壞，甚至提出「科學破產」的喟嘆，間接引發後來著名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sup>67</sup>這趟歐遊可說為梁啓超想衝刺的文教事業添加柴火、累積文化資本，也為後續幾年中國思想界菁英的衝突埋下伏筆。梁啓超與其同人的努力，儼然成為與陳獨秀、胡適《新青年》一派較勁的另一場「新文化運動」，在不同議題上表現時而合作、時而競爭的微妙關係。<sup>68</sup>

梁啓超在歐洲拜訪眾多名流碩彥，其中也包括威爾斯。我們並不清楚梁拜訪威爾斯的確切日期，也缺乏雙方會面的直接紀錄，只能藉由一些蛛絲馬跡來推敲會面過程。梁啓超一行在參加巴黎和會後，從法國赴英，於 1919 年 6 月 7 日至 7 月 12 日間在英國盤桓月餘。<sup>69</sup>這是考察團第二度訪英——當考察團於 2 月初抵歐洲時，首先便落腳倫敦，不過僅短暫停留數日就往法國了。這次訪英有更多餘裕安排活動。梁在英國的行程緊湊，有許多聚會、應酬與演講。據他於 6 月 16 日從劍橋寄給女兒梁思順的信，此趟先赴蘇格蘭，在愛丁堡停留數日，回程訪劍橋，此後行程大部分安排待在倫敦。<sup>70</sup>梁在信中並未提到任何拜訪個別人士的行程，也許這類訪問就安插在應酬空檔或節目未定的日期。

梁啓超透過另一位著名的文學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開始接觸威爾斯。蕭伯納與威爾斯是好友，兩人長期頻繁通信。在 1919

<sup>67</sup>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收入張君勱、丁文江等著，汪孟鄒編，《科學與人生觀》（臺北：問學出版社，1977），頁 3-7。另見林毓生，〈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涵義——對民國十二年「科學與文學論爭」的省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社會思想論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 277-302。

<sup>68</sup> 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梁啓超諸人的文化努力與五四思想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5，頁 63-71。

<sup>69</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462-463。

<sup>70</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462。

年6月12日的信中，蕭伯納向威爾斯介紹梁啟超，聲稱梁在中國是「有如天般崇高的文人」（a Man of Letters in the most Celestial sense）。此前梁已先派丁文江拜訪蕭伯納，表達希望認識威爾斯的意願。蕭伯納寫信幫忙引薦，並提示說丁會主動聯絡威爾斯。<sup>71</sup>這封信寄出時，梁已往愛丁堡，因此可以合理推斷，梁啟超與威爾斯的見面是在從蘇格蘭歸來後的6月下旬或7月初。

從這封信也可看出，丁文江扮演聯絡人穿針引線的功勞。丁文江曾於1904至1911年在英國留學七年，熟悉英國文化，通曉多種歐洲語言。無論是中國同儕或西方人皆常形容丁是「歐化最深的中國人」，稱讚丁掌握道地的西方思維與辦事方法，能在國際場合溝通自如。<sup>72</sup>梁啟超原本不諳歐語，在歐遊途中才加緊學習法文、英文，而丁文江就是他的英文教師。雖然梁「進步甚速」，在短短數月間英文已「大略能讀書讀報」，但不能聽、講，<sup>73</sup>與外國人談話仍需翻譯。丁文江很可能即負責通譯工作，這也是為何梁先遣丁接洽蕭伯納、威爾斯的緣故。更何況丁文江本來即是威爾斯的書迷——據傅斯年回憶，丁文江相當喜愛威爾斯的著作，甚至曾吩咐英國的出版商，凡是有新書出版，立即寄來。<sup>74</sup>丁文江拜訪蕭伯納時，也宣稱蕭伯納與威爾斯名列「在中國最顯赫的五位英語文學家」之內。<sup>75</sup>這話雖然不無恭維之意，也顯示丁對兩人的敬重。由丁文江擔任這項居間聯絡的任務是再適合不過的。

丁文江與梁啟超各自有不同的理由去拜訪威爾斯：前者從科學角度著眼，和威爾斯一樣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演化論的熱切追隨者；後者更看重威爾斯宣揚國際合作、促進和平的世界主義政治層面。在當時的中國，丁文江是少數對演化論有深刻科學認識的專家。雖然嚴復（1854-1921）

---

<sup>71</sup> G. B. Shaw to H. G. Wells, 12 June 1919; J. Percy Smith, ed., *Bernard Shaw and H. G. Well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5), Letter 64, p. 101.

<sup>72</sup>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5-26.

<sup>73</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461、466。

<sup>74</sup> 傅斯年，〈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彩〉，《全集》，卷5，頁483。

<sup>75</sup> G. B. Shaw to H. G. Wells, 12 June 1919; J. Percy Smith, ed., *Bernard Shaw and H. G. Wells*, Letter 64, p. 101.

翻譯《天演論》風行一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口號迅速成爲中國大眾琅琅上口的名言，但輿論重視的還是喚醒群眾認知「生存競爭」真理以救亡圖存的政治思想，而不是生物演化的科學本身。「天演論」原題爲「演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原本是赫胥黎在 1893 年的講座題目，主張自然界的演化不能做爲人類道德倫理的指導原則，宗旨並不是闡明達爾文演化論。嚴復則是藉題發揮「自強保種」之學以呼籲變法，對赫胥黎原文多有改造，刻意添加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社會進化理論與自己的見解。<sup>76</sup>達爾文真正震撼西方科學界的經典著作《物種原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在中國流傳普及程度反而不如嚴譯《天演論》。馬君武（1881-1940）翻譯的《物種原始》中文全譯本遲至 1920 年才完成，且這部譯著也深受嚴復影響。<sup>77</sup>相較於大多數中文讀者一知半解，丁文江早年留英攻讀地質學與動物學，親身接觸演化論相關英語資源，受赫胥黎的著作啓發甚深。威爾斯曾是赫胥黎的學生，其文學創作又常以演化論爲基礎思想，這些都是足以獲得丁文江傾慕的原因。

至於梁啓超，他更關心的是歐戰後的和平方案與建立國際聯盟的倡議，深切盼望中國能藉此實現與列國平等交往的理想。在歐洲考察團出發前，梁啓超已在國內報刊發表多篇政論，闡述對於國際聯盟的支持與期望。例如與《大公報》記者訪談，認爲國際聯盟的主張足以抑止強國對弱國之政治野心，中國自當表示贊成，「加入其間，託於大國家團體之下，保其地位，圖其發達，以求

---

<sup>76</sup> 歷來對嚴復譯《天演論》的研究眾多，僅舉近著例如：王道還，〈《天演論》原著文本的來歷及文化翻譯問題〉，收入彭小妍主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頁 337-366；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5（2014 年 9 月），頁 129-187；Yang Haiyan, “Knowledge across Borders: the Early Communication of Evolution in China,” in Bernard Lightman, Gordon McOuat, and Larry Stewart, eds., *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Between Britain, India and China: the Early-Modern World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iden: Brill, 2013), pp. 181-208.

<sup>77</sup> Xiaoxing Jin, “Translation and Transmutati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52:1 (March 2019), pp. 117-141.

效用於人類社會」。<sup>78</sup>又如前面提到的〈國際同盟與中國〉一文中，宣稱國際聯盟並非高遠而不切實際的理想，甚至舉春秋時代為例，認為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即是這種「世界主義」的精神：

我中國人之思想，謂政治之為物，非以一國之安寧幸福為究竟目的，而實以人類全體之安寧幸福為究竟目的。此種廣博的世界主義，實我數千年來政治論之中堅也。……北方齊（今山東省）晉（今山西省）等大國，以保護弱小之精神，結為協約，以與南方抱侵略主義之楚國（今湖北、安徽等省）對抗。經數十年之久，楚國卒屈服，亦加入此同盟。然後國際大同盟之形成，保持平和百餘年。而我國民化合統一之基礎，實樹於此。……雖今日規模宏大之國際團體，非古代一隅小邦可擬……然可證明此種方式，為羣治進化所必由之徑，且行之而實能有效。蓋論文明之極致，必以吾國古代所謂大同主義（即人類全體大結合共同活動）為究竟。一切歷史，無非向此極修遠崇高之前路，節節進行。<sup>79</sup>

以上言論，無疑和威爾斯的和平反戰與世界統合理念十分契合。威爾斯在歐戰結束前即在媒體上大力鼓吹國際聯盟，又是當今英國文壇名宿，不難想像梁啟超會希望求教相關議題。

梁啟超事後提到，在英時和威爾斯「曾晤數次，談甚洽」，<sup>80</sup>可見雙方相談甚歡，而且不僅見面一次。威爾斯本人的反應未見紀錄，不過雙方會面的一個多月前，威爾斯才剛寫信向羅斯求助關於中國史文獻的問題，因此梁啟超的來訪，無疑有如及時雨般的助益。威爾斯可能趁機向梁啟超請教中國史，最明

<sup>78</sup> 梁啟超，〈歐戰議和之感想（十一月十四日與《大公報》記者談）〉，收入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冊，頁727-729。原載《大公報》，1918年11月15日。

<sup>79</sup> 梁啟超，〈國際同盟與中國〉，收入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冊，頁743。原載《國民公報》，1918年12月8日。

<sup>80</sup> 梁啟超，〈與叔通吾兄書〉（1921年10月4日），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494。

顯的例子就是在《世界史綱》內的「中國古史」一節，引用〈國際同盟與中國〉來敘述春秋時代黃河與長江流域諸國林立的情況。<sup>81</sup>

據當時正好也赴歐訪問的陶孟和（1887-1960）表示，曾在「梁任公先生席上」遇見威爾斯，威爾斯說「正在編述世界通史自人類發生直至近代」；連載刊行後，陶孟和還稱讚《世界史綱》「可稱為一種模範的『新歷史』」。<sup>82</sup>由陶孟和的旁證可見，梁啓超一行在會面中得知威爾斯正在撰寫《世界史綱》。

《世界史綱》的寫作足以引起梁啓超與丁文江極大的興趣。梁啓超對史學的關注不用贅言，早自清末便提倡「新史學」，批判中國傳統史學方法的弊端；然而從政生涯轉移了梁的精力，接著十幾年內未能深入耕耘史學。丁文江在地質學專業之外，對歷史研究也有深厚的興趣與涉獵。作為達爾文主義的信徒，丁深信人類社會的歷史就如同生物物種的演化一般，經歷緩慢卻逐漸進步的演化過程。他對人類學與生物學的熟悉，使他特別容易接受《世界史綱》的普世史框架。丁還認為，對事實分類歸納以尋求秩序與公例的科學方法，能用來研究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任何課題。<sup>83</sup>他鼓勵梁啓超繼續投入將中國史學科學化的未竟志業，謂梁的分析能力極強，該好好運用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因此勸梁放棄政治活動，投入學術研究，當能闖出一番成績。<sup>84</sup>幾年後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丁文江甚至宣稱梁啓超 1922 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在丁看來很明顯是此志業的成果——就跟愛因斯坦談相對論及胡適研究《紅樓夢》一樣，都是符合科學方法的科學。<sup>85</sup>

<sup>81</sup> OH 1920, pp. 101-102; 《史綱》，頁 125。

<sup>82</sup> 陶孟和，〈新歷史〉，《新青年》，卷 8 號 1（1920 年 9 月），頁 8。

<sup>83</sup> 關於丁文江對「科學方法」見解的詳細分析，見林毓生，〈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涵義——對民國十二年「科學與玄學論爭」的省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社會思想論叢》，頁 282-284。丁文江的史學觀，見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p. 80-85.

<sup>84</sup> 丁文淵，〈前言〉，收入丁文江主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1958），頁 6-7。另參見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p. 67-68.

<sup>85</sup>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收入張君勱、丁文江等著，汪孟鄒編，《科學與人生觀》，頁 20。

## 五、《世界史綱》的譯介與《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啓超歐遊返國後，和張君勱等同志大張旗鼓從事新文化事業，積極撰述、譯書、講學與辦學。<sup>86</sup>研究者經常忽略的是梁啓超在百忙之中還親身投入《世界史綱》的翻譯，非常熱心推動其中譯本出版。梁啓超和商務印書館高層陳叔通（1876-1966）、張元濟（1867-1959）與高夢旦（1870-1936）等人多次來信往返討論相關事宜。例如 1921 年 10 月 4 日梁寫信給陳叔通，大力推薦《世界史綱》，並談到譯書工作的細節：

昨書言韋爾思《史綱》譯事，想已達。韋氏為當代一著名文學家（吾在英時曾晤數次，談甚洽，彼書亦有徵引吾說者），其書文極優美，在歐諸友曾勸吾譯之，吾英文既不通，為事甚勞，故未之許也。小兒輩自告奮勇，約同學三人以從事，彼輩於文學絕無素養，其辜負原著自無待言，吾因欲授小兒以國文，故本年暑假三箇月中，每日分半日為之改潤（現仍每日分兩點鐘為之），故此書雖號稱兒曹所譯，實則無異我自譯（亦可謂私愛厥子，借此教授），因其書為文學的，故吾於行文特加注意，往往竟半日僅改千字耳（吾自著書每日總在四千言內外）。吾改時置譯者於旁（亦自用原書參考），疑輒閱之，自信此改本可謂信達雅兼備矣（此書若譯筆拙劣則精華盡失矣）。現改定者約三分之一而強，待彼輩騰清，即可發印。故望商館仍將此書全委我手（吾尚擬致書韋氏請其更作一序），準明春三月杪全部完成。<sup>87</sup>

由此可知當時就讀清華學校的梁思成（1901-1972）自願替父親代勞，與同學合作翻譯；<sup>88</sup>梁啓超還不放心，親自潤筆校訂，所花的時間與心力讓他自認「無

<sup>86</sup> 相關文化事業細節可見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頁 137-159。

<sup>87</sup> 梁啓超，〈與叔通吾兄書〉（1921 年 10 月 4 日），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494。

<sup>88</sup> 據梁柏有記述，參與翻譯者尚有梁思永、陳訓恕。見梁柏有編著，《思文永在——我的父親考古學家梁思永》（北京：故宮出版社，2016），頁 24。但梁柏有記述簡略，且下文說《世界史綱》「於 1923 年分成 4 卷出版」，似不確。筆者並未查到梁等人的譯本於 1923 年出版。另參

異我自譯」。從很多細微處能看出梁啓超對《世界史綱》的重視：例如梁特別注重譯筆能如同原文般優美，也極力爭取由他經手全書編譯，甚至還提出請威爾斯為中譯版寫序的主意（雖然最後並未實現）。商務印書館原本已有另請他人翻譯《世界史綱》的計畫，梁啓超向張元濟表示譯書正進行中，「屬為停譯」，張元濟只得要求梁譯稿仍需「由本館出版」。<sup>89</sup>梁啓超還特別關照排版品質，希望「字稍大，每字中嵌士丕士」（即 space），即便會使成本增加也在所不惜。<sup>90</sup>

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等人密集翻譯《世界史綱》的這段時間（1921 年暑期與秋季），正值梁啓超在天津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文化史。講座從 1921 年 9 月 12 日開始，於每星期一、三、五的下午 4 時至 6 時講演，天津各校教員學生旁聽者甚多，聽眾可達數百人。任公為此次講學準備得十分賣力，這門課的講稿旋即於翌年出版，即著名的《中國歷史研究法》。<sup>91</sup>由此可見校譯《世界史綱》的工作，與任公在南開的備課、教學是同步進行的。《世界史綱》對梁啓超發展其史學論述，實有後世學者忽略的啓示作用。

《世界史綱》對《中國歷史研究法》的隱約影響，可以從 1921 年 9 月 1 日梁啓超在南開大學始業式上的演說透露端倪。梁在演說中勉勵學生注意學術，特別提到中國人在「整理國故」方面佔的優勢。他指出，外國人由於對中國的情形不清楚，難以收集中國的材料，故「若是歐美最著名的史學家，也不能把中國歷史作好，因為他不知道中國歷史上的變遷，且不能參證中國的古書」。他還勉勵學生務須視野廣闊，發揚國學：「中國的歷史、文學、哲學、

---

見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歷史·傳記·考古·地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上冊，頁 15。

<sup>89</sup>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下冊，頁 801。此則記於 1921 年 9 月 23 日。

<sup>90</sup>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冊，頁 802。此則記於 1921 年 9 月 25 日。

<sup>91</sup> 王文俊等選編，《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頁 174；梁啓超，〈自序〉，《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序頁 2。另見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頁 154。

美術學……不獨為中國的學問，亦是世界人類的。」<sup>92</sup>梁啟超與其同志當時正欲將勢力紮根於南開、清華等校，作為其培養人才的「關中、河內」。<sup>93</sup>一方面他響應胡適「整理國故」之呼籲，甚至有後起凌駕之勢；一方面也反映其在歐遊後，思想轉向「東方文化派」，期望以中國文化作為調劑西方文化的良藥。<sup>94</sup>故任公這番感言似乎不足為奇。然而，這個時間點也正是梁在南開講授中國文化史之始，且梁氏父子還在不久前密集投入《世界史綱》校譯，可知此言並非偶然而發，是精讀《世界史綱》後的心得。

講座聽眾之一的杜協民也提供有趣的旁證。杜協民相當景仰梁啟超，不但記錄其在始業式上的演說，還在講座結束後撰文綜述授課內容，推崇梁為「中國歷史的改造家」。杜在文中特別提到威爾斯，稱讚《世界史綱》是近來史學界「最有價值」的新書，但威爾斯對中國的歷史卻「不大很清楚」，言下之意是還欠缺一部中國通史。那麼「就〔究〕竟有誰擔負這個大責任呢？」不消說自然是梁啟超。杜大膽預言：梁預定編撰的「中國文化史綱」（《中國歷史研究法》是其首卷）成書後，「其價值一定與西方的韋爾思著的《歷史大綱》可比」。<sup>95</sup>杜協民對史學的心得雖然粗淺，對梁啟超的讚譽也不無崇拜的成分，但從其將梁的史學志業與威爾斯《世界史綱》相提並論，《世界史綱》對梁講座的影響可見一斑。

<sup>92</sup> 協民記，〈梁任公先生在本校大學部開學時之演說〉，《南開週刊》，期 13（1921 年 9 月 28 日），頁 4-7；〈校聞：大學部始業式之盛況〉，《南開週刊》，期 13（1921 年 9 月 28 日），頁 12。另見王文俊等選編，《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頁 817-818。

<sup>93</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154-156。

<sup>94</sup> 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梁啟超諸人的文化努力與五四思想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5，頁 80-82；王晴佳，〈從整理國故到再造文明：五四時期史學革新的現代意義〉，收入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輯 5，頁 133-134。關於梁啟超對東西文化論戰與「東方文化派」之啟發，見伍啓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上海：現代書局，1934），頁 93-95。

<sup>95</sup> 杜協民，〈中國史學之改造家〉，《南開週刊》，期 26（1921 年 12 月 29 日），頁 7。杜協民生卒年不詳，在 1920 至 1930 年代為《大公報》記者、重慶《國民公報》總編輯，並於 1938 年底任貴州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見〈各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任免案（一）〉，國史館藏，《國民政府》，典藏號 001-032260-00001-007。

前面提過丁文江鼓勵梁啓超重拾史學研究；《中國歷史研究法》之成，丁文江扮演的角色也耐人尋味。我們已知丁文江也曾協助校訂《世界史綱》譯稿。<sup>96</sup>據其弟丁文淵（1889-1957）回憶，丁文江不僅是梁的英文老師，還「介紹了好幾部研究史學的英文書籍」，梁根據這些新材料才完成《中國歷史研究法》。<sup>97</sup>究竟這些英文史學新材料包括什麼？這是學界的未解之謎。杜維運（1928-2012）曾試圖推敲《中國歷史研究法》究竟受到哪些西方史學流派影響，認為梁的史學方法論與法國史學家朗格諾瓦（Charles U. Langlois, 1863-1929）、瑟諾博斯（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合著《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頗多相合之處。<sup>98</sup>但杜維運也指出，梁啓超所受西方史學的影響超出朗、瑟二氏所能範圍，必定有其他來源。杜的分析也提到丁介紹梁英文書一事，但並不清楚確實書目，也對梁的外語能力是否足以通讀英文史學書籍存疑。儘管如此，杜維運仍認為梁啓超綜合中西史學的能力堪稱卓越，並非以西方理論配合中國事例，也絕非籠統地將西方史學方法移植過來中國。<sup>99</sup>

筆者以上的論證，並不是說《世界史綱》就是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的來源。《世界史綱》不是史學方法論專著，威爾斯的通俗筆法，也屢遭史學專家詬病。從梁啓超在南開的演說，亦可看出梁對「外國人做中國史」多犯謬誤，頗有微詞。然而《世界史綱》為何仍獲得梁啓超青睞？筆者以為，這是由於《世界史綱》運用不同科學領域的知識來詮釋人類史，深入淺出地敘述「以

<sup>96</sup> 梁啓超提到「譯成後復經丁在君校閱一過」，見梁啓超，〈與夢旦、叔通兄弟〉（1922年2月3日），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500-501。

<sup>97</sup> 丁文淵，〈前言〉，收入丁文江主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7；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 68.

<sup>98</sup> 杜維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1980年6月），頁315-323；黃克武，〈百年以後當思我：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再反省〉，收入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58-59。

<sup>99</sup> 杜維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份，頁322-323。

前的人活動的因果，及從前社會內部的組織」。<sup>100</sup>威爾斯敘史的宏觀架構，把種種清末以降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如何建立「新史學」所感興趣的課題，如史前文物的發掘、人種與民族的分化、語言與文字的作用，以及宗教、科學與政治思想之變遷，有如櫥窗般綜合性地做了廣泛的演示。威爾斯還將中國放到「世界史」的體系裡，同其他文明一齊比較。以上皆無意間呼應了梁啟超早年以「民史」對抗「君史」，以及將中國史放入亞洲、世界框架的嘗試。<sup>101</sup>

儘管梁啟超熱心地向商務印書館承諾「明春三月」（即 1922 年）就能譯完全書，但從往來書信來看，實際進度還是延宕超過一年。例如 1922 年 10 月，張元濟提醒梁啟超：「西史大綱甚盼早日脫稿。」<sup>102</sup>至 1923 年 3 月，梁啟超寫信給高夢旦說明進度，亦自請處分，對督導不周表達歉意：

小兒等所譯《史綱》原稿五冊，又序例一冊寄上，此不過全書三分之一，其餘於一月內續寄，蓋彼輩於統一譯名尚須檢改也。弟當別作序一篇，亦一月內寄上。譯筆自不能滿意，但彼輩尚謹慎，或無甚錯處耳。前年曾代彼輩請求每千字酬六元，乃是預定弟潤文後之酬金，弟既未全踐責，即亦不敢作此請，擬乞酬以每千字四元，何如？<sup>103</sup>

由此可知譯書進度拖延甚多，連梁啟超都沒辦法照預定計畫校潤全書，更別提信中預計「一月內寄上」的序，最終仍無下落。

梁啟超的健康惡化與外務纏身恐怕是造成延宕的主因。梁自歐遊歸國後，事務繁忙，陸續在南開、清華與東南大學等校開課，又忙於著述與巡迴各地演講，加上常應酬醉酒，操勞之下竟於 1922 年 11 月心臟病發，不得不暫停大部分工作好休養。<sup>104</sup>梁致高夢旦的信也提到他正「遵醫戒養病，暫屏絕費心血之

<sup>100</sup> 此引句出自杜協民，〈中國史學之改造家〉，《南開週刊》，期 26，頁 6。

<sup>101</sup> 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2019），頁 24。

<sup>102</sup> 張元濟，〈致任公吾兄同學書〉（1922 年 10 月 12 日），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510。

<sup>103</sup> 梁啟超，〈與夢旦兄書〉（1923 年 3 月 20 日），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525。

<sup>104</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511-513。

著作」。<sup>105</sup>這難免會影響到他原本雄心萬丈的《世界史綱》校譯工作。

另一方面，英文原書也迭出新版，與梁所據的舊版已頗有出入。商務印書館後來不得不另請向達(1900-1966)、黃靜淵(1898-1993)、陳訓恕(1905-1931)與陳建民，根據 1923 年與 1926 年版重加翻譯，還請科學界和教育界專家如任鴻雋(1886-1961)、秉志(1886-1965)、竺可楨(1890-1974)與徐則陵(1887-1972)等，再校訂前半部與自然科學關係密切之內容，並由何炳松(1890-1946)總校訂之成，可見主事者的慎重。<sup>106</sup>商務印書館最終遲至 1927 年 6 月才出版《世界史綱》中譯本。

梁啓超雖然沒達成校潤全書的目標，對《世界史綱》中譯本的貢獻仍然不可小覷，最明顯的是加入大量原著沒有的注解，特別是在佛教史相關部分。這些注解有的是補充說明，有的甚至指正原著的錯誤或值得商榷之處。以第 25 章「佛教之興起與傳布」來說，就共有 10 個原書未見的注解。例如威爾斯描述印度古代海路交通不盛，「著印度史者，可至距今四百年而不一提海字也」，梁啓超加案語指正：「此語非是……法顯、真諦、義淨、不空，皆乘海船以往還中印間也。」<sup>107</sup>原書提到原始佛典用巴利語(Pali)紀錄，梁啓超也補充說：「此語待商。巴利語佛典，誠不失為最古佛典之一種，然同時亦有以他種語記錄者，拙著《中國佛教史》有專章詳考之。」<sup>108</sup>而原著描述佛陀、玄奘等人事蹟的段落，中譯本也不從英文直譯，而是費心尋找原典引用，並加譯註說明，如：「此處譯者引用佛經，故與原書略有出入；惟仍頗與原文相緊扣。見《佛本行集經》卷……。」<sup>109</sup>這些翻譯與考據功夫，需要對佛經典故有相當程度的瞭解，非梁思成等「小兒輩」所能及，無疑出自梁啓超之手。

<sup>105</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525。

<sup>106</sup> 王雲五，〈序〉，《史綱》，序頁 1。

<sup>107</sup> 《史綱》，頁 301。

<sup>108</sup> 《史綱》，頁 302。

<sup>109</sup> 《史綱》，頁 303。

## 六、結 語

《世界史綱》新穎的體裁與對中國史的關注，自 1920 年成書以來吸引無數中國讀者討論。朱經農在《新潮》的書評就指出威爾斯很留心中國文化，「在泰西史學家中間真算不可多得」，但「在蟹行文字中求中國史料」難免有錯，還列舉書中多處謬誤。<sup>110</sup>儘管如此，他對威爾斯別開生面的嘗試依然十分讚賞。羅家倫（1897-1969）也將其意見附誌於朱經農的書評後，認為正由於威爾斯不是史學專家，才能單槍匹馬「殺入歷史的領土，如入無人之境；可以推翻歷史界許多舊觀念，惹起歷史界許多新問題」。羅家倫並總結，威爾斯的思想雖不精深，但讀其作品除可領略文學外，還可與「同時代思想相接近」，是「當代著作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個人」。<sup>111</sup>《新潮》書評刊出後不久，當時正為商務印書館編輯中國通史教科書的顧頡剛（1893-1980），也尋思「多用些外國材料」，並詢問讀過《世界史綱》的友人潘家洵（1896-1989）書裡對中國史的意見。<sup>112</sup>從這些反應，可見新文化運動高峰時《世界史綱》在青年知識分子間掀起的興趣與話題。

當然，並不是所有中國讀者對威爾斯的普世史創作都持正面意見。正如《世界史綱》在西方毀譽參半，它在中國也獲得褒貶不一的評價。中國讀者多關注書裡所呈現的中國史實是否正確無訛，以及非西方文明的歷史是否佔適當的比例。儘管威爾斯主觀上欲避免歐洲中心論的敘事傳統，努力增加歐洲以外種族及文明的材料，部分中國讀者仍不滿意，認為中國史或非西方文明史的內容太少。甚至批判威爾斯以演化論為基礎的世界史觀，仍舊以歐洲史及西方經驗做為基準，來剪裁或比較其他區域文明的歷史。這類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以雷海宗為早期的代表。類似的意見其實不獨中國讀者持有。要將縱橫千萬年的人類

<sup>110</sup> 朱經〔朱經農〕，〈《世界史大綱》（威爾斯著）〉，《新潮》，卷 3 號 2，頁 46。

<sup>111</sup> 朱經〔朱經農〕，〈《世界史大綱》（威爾斯著）〉，《新潮》，卷 3 號 2，頁 50、52。

<sup>112</sup> 顧頡剛，〈致潘家洵〉（1922 年 4 月 10 日），收入俞國林編，《顧頡剛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1，頁 170-171。

歷史全納入一部書中，自然不是易事；無論再怎樣淘洗精煉，難免面臨取捨失當的批評。劉德美舉例《世界史綱》在西方遭遇類似的責難，如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批評威爾斯對法國所知甚少；美國史學界也批評《世界史綱》對美國不夠瞭解；威爾斯身為英格蘭人也難免成見，書中對大不列顛在愛爾蘭統治的暴行顯得輕描淡寫。<sup>113</sup>作為獨立分支學科的「世界史」在威爾斯撰書的年代還不存在，而《世界史綱》欲包羅萬象兼以一種核心思想貫串史事，固然具開創性，但也使其書一成便注定引發爭議。<sup>114</sup>

威爾斯鑒於歐戰的破壞而提倡國際聯盟，並深感國族主義史學之弊，欲撰寫一部人類共同之歷史來宣揚世界統合的理想。《世界史綱》即是基於此種政治與教育改革理念而生的作品。威爾斯撰寫此書時，歐遊考察的梁啟超與丁文江剛好躬逢其盛，彼此有一番交流。在丁文江激勵下，梁啟超歐遊歸國後轉向學術研究，也延續其早年提出「新史學」將中國史學科學化的志業。梁努力的成果呈現在 1921 年南開的講座及隨之成書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同時梁啟超父子也積極投入《世界史綱》的翻譯與校潤。《世界史綱》雖然不是梁啟超史學方法論直接的來源，對於梁欲以新史學書寫一部「中國文化史綱」的雄心壯志，不啻是關鍵的刺激與示範。

威爾斯既然不是史學專家，《世界史綱》對中國史的書寫大致上綜合當代西方漢學家的普通知識，反映出自歐洲啟蒙時代以來，從西方視角觀察中國文明所累積的印象。威爾斯質疑漢字不便普及的缺陷，便是此類西方觀點的範例。然而威爾斯在寫作期間也和傅斯年與陳源往來。這兩位青年留學生對《世界史綱》提出不少意見與指正，威爾斯從善如流，在修訂版中多處對二人致意。

<sup>113</sup> 劉德美，〈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綱》——一部通俗的世界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8，頁 524。

<sup>114</sup> 另一則軼事能充分表現世界史書寫的困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50 年代欲編寫一部世界史，其中第 4 卷（1300-1775）主編戈特夏克（Louis Gottschalk, 1899-1975）欲將卷名定為「歐洲的世紀」，遭到編輯委員會主席否決，理由是世界史涉及的每個區域都是平等的。戈特夏克後來意識到無法完成一部大家都滿意、誰也不冒犯的著作，只好請辭。見馬克菀，〈困境與反思：「歐洲中心論」的破除與世界史的創立〉，《歷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頁 4，註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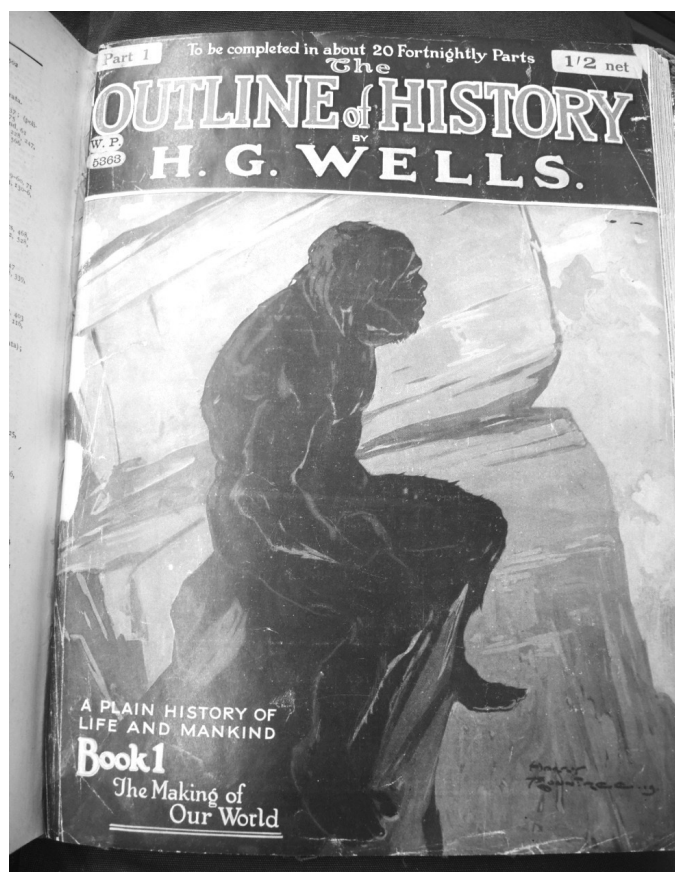
因此《世界史綱》裡的中國史，不全是西方印象，也反映了新文化運動思潮下中國知識分子反思國史的觀點。

本文限於篇幅，有許多面向未能開展，像是威爾斯的史學、科學與政治思想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廣泛的影響，以及《世界史綱》在中國的流通與讀者反應，尚待專文討論。這部由梁啟超等人校訂的中譯版，傳布上不侷限於 1930 年代以前的中國大陸，也擴及戰後的臺灣。例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的一本第四版（1930 年），書名頁上便有「1952 年夏購自興寧舊書攤」的筆記（附圖 2）。臺灣商務印書館在 1966 年發行「臺一版」，臺北的人文出版社、大林書局等均曾重印銷售，可見至少到 1980 年代還流通一時，不因是半世紀前的作品而被束諸高閣。<sup>115</sup>《世界史綱》對於歷史書寫與歷史教育引發的現象及相關爭議，在百年後仍歷久彌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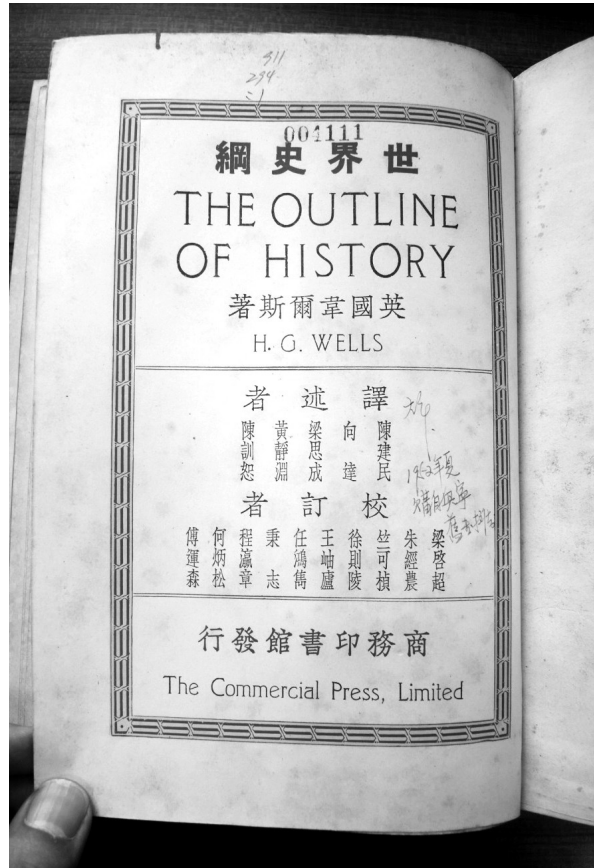
<sup>115</sup> 劉德美，〈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綱》——一部通俗的世界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8，頁 514。

附圖 1 《世界史綱》初版連載第 1 期封面



資料來源：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Part 1, London: George Newnes, November 21, 1919. Courtesy: British Library. 作者拍攝。

附圖 2 商務印書館發行《世界史綱》第四版（1930）書名頁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作者拍攝。

附表 1 《世界史綱》英文版與商務印書館中文版發行年表

年	英文版	商務印書館中文版
1919-1920	Series, 24 parts (London: George Newnes)	
1920	Revised & Corrected Edition (London: Cassell & Co.)	
	Revised & Corrected Edition (London: Waverley Book Co.)	
1923	Definitive Edition (London: Cassell & Co.)	
1925-1926	Series, 24 parts (London: Cassell & Co.)	
1927		《漢譯世界史綱》初版、再版
1928		《漢譯世界史綱》三版
1929		萬有文庫《世界史綱》初版 (平裝10冊)
1930	The Fifth Revision; Popular Edition (London: Cassell & Co.)	《漢譯世界史綱》四版
1932	The Seventh Revision (London: Cassell & Co.)	
1934		大學叢書(教本)《世界史綱》國難後 第一版(平裝4冊)
1935		大學叢書(教本)《世界史綱》國難後 第一版(精裝2冊)
1951	Revised and brought up to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by Raymond Postgate (London: Cassell & Co.)	
1966		《世界史綱》臺一版(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
1972	Revised and brought up to date by Raymond Postgate (London: Cassell & Co.)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製。

附表 2 《世界史綱》有關中國的部分

章	章標題	節	節標題	備註
12	人類之種族			插圖舉例東亞及美洲「蒙古種人」含中國人。
13	人類之語言	6	中國語	
14	最初文化	5	中國古史	論中國文明起源、五帝傳說時代、商、周、春秋戰國、秦始皇統一、漢。
16	文字	1	象形文字	論中國文字特性，認為西方字母文字、蘇美楔形文字優於中國文字。
		2	分音文字	
17	神與星僧侶與國王	7	始皇帝焚書	
18	田奴隸社會階級及自由人	7	中國官制	
25	佛教之興起與傳布	4	佛教與阿育王	提到中國觀音信仰與佛教之關係。
		5	中國兩大師	孔子、老子，以及儒釋道三家。
29	基督教之發端隆盛及分派	4	統一世界之新宗教	提到墨子，認為墨子與耶穌之思想相近。
30	亞洲七百年史	7	中國之盛世	論魏晉南北朝、隋、唐。
		8	中國智慧之束縛	
		9	玄奘之遊	
33	成吉思汗及其後裔之大帝國			提到忽必烈建立元朝、馬可·波羅東遊。
35	君主國會與強國	10	俄羅斯侵略太平洋	提到滿洲人入主中國。
38	十九世紀之實情與理想	10	中國之改革	論晚清時西方列強的侵略、維新運動、義和團事變、辛亥革命。

資料來源：《世界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國難後第一版）。作者根據原書內容整理自製。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

- 〈各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任免案（一）〉，國史館藏，《國民政府》，典藏號 001-032260-00001-007。
- 丁文江主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1958。
-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
- 王文俊等選編，《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
- 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
- 王定保著，陽羨生校點，《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歷史·傳記·考古·地理》，上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
- 吳于廑，《吳于廑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 韋爾斯著，梁思成等譯，《世界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俞國林編，《顧頡剛書信集》，卷 1，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梁柏有編著，《思文永在——我的父親考古學家梁思永》，北京：故宮出版社，2016。
- 梁啓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陳西滢，《西滢閒話》，臺北：文星書店，1964。
-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 張君勱、丁文江等著，汪孟鄒編，《科學與人生觀》，臺北：問學出版社，1977。
- 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卷 1、5、7，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 Smith, David C.,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H. G. Wells: Volume 3 1919-1934*.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1998.
- Smith, J. Percy, ed. *Bernard Shaw and H. G. Well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5.
- Voltaire. *An Essay on Universal History, the Manners, and Spirit of Nations*. Translated by Nugent. London: J. Nourse, 1759.
- Wells, H. G., *History is One*. Boston: Reprinted by Ginn and Company from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19.
- Wells, H. G., *The Outline of History*. London: George Newnes, 1919-1920.
- Wells, H. G., *The Outline of History*.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1920.
- Wells, H. G., *The Outline of History*.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1923, the definitive edition.

## 二、報刊

- 《大公報》（天津），1918。  
《史學》（上海：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期1，1930。  
《南開週刊》（天津：南開大學），1921。  
《國民公報》（北京），1918。  
《現代評論》（北京：現代評論社），1926。  
《新青年》（上海），卷8號1，1920。  
《新潮》（北京：新潮社），卷3號2，1922。  
《清華學報》（北京：清華學校），卷4，1927。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901.

## 三、專著

-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r）著，林熙強譯，《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  
伍啓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上海：現代書局，1934。  
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8。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2019。  
Furth, Charlotte.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herborne, Michael. *H. G. Wells: Another Kind of Life*. London: Peter Owen, 2010.  
Smith, David C. *H. G. Wells: Desperately Morta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四、論文及專文

- 王道還，〈《天演論》原著文本的來歷及文化翻譯問題〉，收入彭小妍主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頁337-366。  
王晴佳，〈從整理國故到再造文明：五四時期史學革新的現代意義〉，收入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輯5，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127-138。

- 丘爲君，〈戰爭與啓蒙：「歐戰」對中國的啓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3，2005 年 5 月，頁 91-146。
- 朱慈恩，〈略論韋爾斯及其《世界史綱》在中國的影響〉，《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9 期 5，2013 年 10 月，頁 60-64。
- 杜維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1 本第 2 分，1980 年 6 月，頁 315-323。
- 吳延民，〈民國以來國內史學界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史學理論研究》，2015 年第 4 期，頁 116-126。
- 林毓生，〈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涵義——對民國十二年「科學與玄學論爭」的省察〉，收入林毓生著，《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社會思想論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 277-302。
- 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梁啓超諸人的文化努力與五四思想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5，2019 年 9 月，頁 49-89。
- 馬克菴，〈困境與反思：「歐洲中心論」的破除與世界史的創立〉，《歷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頁 3-22。
- 馬克堯，〈威爾斯《世界史綱》評介〉，《讀書》，1982 年第 12 期，頁 45-52。
- 陳志強，〈雷海宗批評「歐洲中心論」——以〈評漢譯韋爾斯著《世界史綱》〉爲例〉，《史學理論研究》，2012 年第 3 期，頁 128-132。
- 黃克武，〈百年以後當思我：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再反省〉，收入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58-59。
- 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5，2014 年 9 月，頁 129-187。
- 劉德美，〈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綱》——一部通俗的世界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8，1990 年 6 月，頁 513-528。
- 韓琦，〈關於 17、18 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科學落後原因的論述〉，《自然科學史研究》，卷 11 期 4，1992，頁 289-298。
- Jin, Xiaoxing. "Translation and Transmutati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52:1 (March 2019), pp. 117-141.
- Skelton, Matthew. "The Paratext of Everything: Constructing and Marketing H. G. Wells'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Book History*, vol. 4 (2001), pp. 237-275.
- Yang, Haiyan. "Knowledge across Borders: the Early Communication of Evolution in China." In Bernard Lightman, Gordon McOuat, and Larry Stewart, eds., *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Between Britain, India and China: the Early-Modern World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iden: Brill, 2013, pp. 179-208.

## H. G. Wells'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in China: Writing,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History

Hsiang-Fu Huang\*

### Abstract

*The Outline of History* by the English writer H. G. Wells is an ambitious work of popular world history. Wells narrates a universal history cove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humankind, from the origin of life to the First World War, in a concise and lucid way. Because Wells was not a professional historian, his unconventional treatment of historiography made this bestseller receive mixed reviews. The popularity of the *Outline* was not confined 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e title's representation of multiple cultures and nation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along with its discussion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immediate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readers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1920. Wells's sources of Chinese history came from not only the common knowledge accumulated by contemporary Western Sinologists, but also personal contacts with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Liang Qichao, Ding Wenjiang, Fu Sinian, and Chen Yuan (Xiyong). Liang Qichao also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Outline*. The title's macro-nar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and its depic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in the frame of world history, provided an inspiration for Liang's project of transform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owever, Wells's attempt to shape a common history of mankind based on evolution was criticized by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such as Lei Haizong for failing to avoid Eurocentrism.

**Keywords:** H. G. Wells, cosmopolitanism, universal history,  
Liang Qichao, new history

---

\*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